

考试与求知:医学生必修的第一课

陈德昌

认真读书,考试取得个好成绩,上个好学校,毕业后找个好工作。这是一条“成功”的直通道,也是在校学生的共同愿望。梅贻琦先生任职清华大学校长时期,清华学生有三难:进校门难,读学分难,出校门难。清华对教学质量的要求严格,北京协和医院也一样。有位学生用手电筒观察病人巩膜是否黄染,而非自然光,主考老师给了他 59 分,就这一分之差,学生过不了关。协和的教授对自己、对学生都能严格要求,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。文革推崇张铁生交白卷,不仅荒谬,而且误人子弟。

自古以来,考试被公认为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。然而,考试也会出现很多问题。近日里,读了中国台湾大学一位教授写的文章。他写道:“在台大教学 18 年,我最担心的学生是每科都拿第一名的传统好学生。”为什么?考试追求好成绩有什么不对吗?教授讲了一则故事。台大一名学生从高中到大学,考试成绩漂亮,金榜题名,是“书卷奖”得主。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每科成绩都是“A”。然而,一门必修的重要课程他上了几个月就退出了。美国同学和老师认为不可思议。来年,他再次选这门必修课,虽然加倍努力,考试只得了一个“B”。这是他第一次拿到了一个不是“A”的成绩。究其真相,原来是这位学生怕拿不到“A”,最初不敢攻读这门重要的必修课程。“B”的成绩让他沮丧。他去见美国指导教授时抬不起头来,而教授泰然地说:“从今日起,你再也不必为拿“A”而念书,你总算可以放胆去做更重要、更有价值的事了”那么,什么是更重要、更有价值的事?答曰:“去犯错和创新,凭借课本教你的基础,去犯错误,尝试创新,这才是有价值的。”这是美国教授给这位台大学生上的最珍贵的一课,也许是在我国一般大学里没有教给学生的。

台大教授之所以担心那种类型的“传统好学生”,不是因为他们每科都拿第一名,是担心他们背上包袱。害怕拿不到“A”而丢面子,因此造成了保守的心态,妨碍了自己潜能的发挥。“好学生”不自觉地陷入误区,偏离了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正确目标。回想我在巴黎期间,曾有机会见到几位中国留学生。他们很苦恼,做不好研究,又不愿放下架子求教,或者不够下功夫做好研究,却冥思苦想,揣摩如何写好论文。他们是国内的尖子,怕丢面子,令我吃惊。环顾欧洲学生,他们不怕被别人笑,敢提问题,敢发表意见,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。中国的留学生不敢开口,显得拘谨。为什么要到美国求学?为什么在去美国求学之前,从来没有发现过?为什么从外国的文化反射出来,才能看清自己的问题呢?

其实,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责怪那些可怜的“好学生”。他们是应试教学诸多弊端的替罪羊。在现行的升学制度下,游戏规则就是“谁会考试,谁就是赢家”。由此可以走向另一个极端。《南方周末》2013 年 10 月 10 日一篇报道,读来瞠目结舌。一所衡水中学,2013 年有 104 名学生考入北大、清华,独占清华、北大招生人数的 80%。那些学生的照片张贴在街道墙上,一字排开。这是一家地道的“超级高考工厂”,把学生放在生产流水线上,把工业生产管理移植到教育。学生的起居学习都严格控制在校方规定的时间表上。“看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”。即使站在操场上,学生手中都拿着书本在朗诵。跑步操练,稍有间隙就开卷学习,学生发呆、吃零食、尿急上厕所,都会被记录、被扣分。悬在学生头顶上的“道德律令”是“衡中三问”:我来衡中做什么,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,我今天做得怎么样。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校长本人的真实思想,他要学生做个什么样的人。校长有一句话:“我们学校要出更多的吴仪、要出更多的鲁迅。”让我们读一读鲁迅缅怀他那位日本解剖学老师写的文章,让我们想一想鲁迅一生的历程和所接受的教育。衡水中学这般教育模式能造就鲁迅吗?我不信这个邪。我们国家处在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时期,正在大力扶植创新人才。把衡水中学推上“封神”之路,说明教育界思想认识之混乱。

应试教学是强制性灌输,不给学生思考的时间,一味地给出标准答案,不让学生独立思考。应试教学压制创新思维,追求的是升学率。应试教学可以训练出一大批有执行才干的技术人员。他们能复制别人的研究成果。然而,精英教学重在培养有创新思维能力、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。首先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,独立思考的创新思维能力是培养出来的,不是训练出来的。要学会做研究,如同探索一个无底洞,研究的回报比较慢,有风险,是更大的挑战。所谓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”,是不断寻求突破,继续为下一代积累新知,以创新造福人类,这才是追求知识的本质。我希望那些“传统好学生”在进入北大、清华后,也能清醒地自问:“来北大、清华做什么,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。”我也相信北大、清华的教授们能够教给这些学生在衡水中学没有教给他们的“重要一课”。这也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师们需要十分重视的大事。说到底,办大学的目的是,一是学术研究,一是造就人才。要办好大学,师资是第一要素。